



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

施蒂格勒自传

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

Nobel Economics Prize

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

[美] 乔治 J. 施蒂格勒 (George J. Stigler) 著

李君伟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

施蒂格勒自传

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

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

[美] 乔治 J. 施蒂格勒 (George J. Stigler) 著

李君伟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施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 / (美) 乔治 J. 施蒂格勒 (George J. Stigler) 著；李君伟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6

(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

书名原文：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

ISBN 978-7-111-53881-3

I. 施… II. ① 乔… ② 李… III. 施蒂格勒—自传 IV. K837.1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107665号

本书版权登记号：图字：01-2015-7525

George J. Stigler. 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

Copyright © 1988 by Basic Books, In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hina Machine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sic Book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Basic Books 通过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地区) 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施蒂格勒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

出版发行：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100037)

责任编辑：岳小月

责任校对：董纪丽

印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201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170mm × 242mm 1/16

印张：14.75 (含 0.5 印张插页)

书号：ISBN 978-7-111-53881-3

定价：60.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客服热线：(010) 68995261 88361066

投稿热线：(010) 88379007

购书热线：(010) 68326294 88379649 68995259

读者信箱：hzjg@hzbook.com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封底无防伪标均为盗版

本书法律顾问：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韩光 / 邹晓东

丛书序一

厉以宁 北京大学教授

机械工业出版社经过长期的策划和细致的组织工作，推出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该丛书预计出版经济学获奖者的专著数十种，精选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代表性成果和最新成果，计划在三四年内面世。我以为这是国内经济学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贺。

要知道，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学领域内名家辈出，学术方面的争论一直不断，许多观点令经济学研究者感到耳目一新。这既是一个怀疑和思想混乱的时期，也是一个不同的经济学说激烈交锋的时期，还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断探索和在理论上寻找新的答案的时期。人们习惯了的经济生活和政府用惯了的经济政策及其效果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学家普遍感到有必要探寻新路，提出新的解释，指明新的出路。经济学成为各种人文学科中最富有挑战性的领域。难怪不少刚刚步入这个领域的经济学界新人，或者感到困惑，或者感到迷茫，感到不知所措。怎样才能在经济学的海洋中摆对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应当从何处入门，以便跟上时代的步伐。机械工业出版社推出的这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等于提供了一个台阶，也就是说，这等于告诉初学者，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各位经济学家是怎样针对经济学中的难题提出自己的学说和政策建议的，他们是如何思考、如何立论、如何探

寻新路的。这就能够给后来学习经济学的年轻人以启发。路总是有人探寻的，同一时期探寻新路的人很多，为什么他们有机会进入经济学研究的前沿呢？经济学重在思考、重在探索，这就是给后学者最大的鼓励、最重要的启示。

正如其他人文科学一样，经济学研究也必须深入实际，立足于实际。每一个新的经济观点的提出，每一门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形成，以及每一种新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倡导，都与实际有关。一个经济学家不可能脱离实际而在经济学方面有重大进展，因为经济学从来都是致用之学。这可能是经济学最大的特点。就以“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所选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著作为例，有哪一本不是来自经济的实践，不是为了对经济现象、经济演变和经济走向有进一步的说明而进行的分析、论证、推理？道理是很清楚的，脱离了经济的实际，这些分析、论证、推理全都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即经济学的验证经验是滞后的，甚至可以说，古往今来凡是经济学中一些有创见的论述，既在验证方向是滞后的，而在同时代涌现的众多看法中又是超前的。验证的滞后性，表明一种创新的经济学研究思路也许要经过一段或短或长的时间间隔才能被变化后的形势和经济的走向所证实。观点或者论述的超前性，同样会被经济的实践所认可。有些论断虽然至今还没有被完全证实，但只要耐心等待，经济演变的趋势必然迟早会证明这些经济学中的假设——都会被人们接受和承认。回顾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经历和学术界对他们著作评价的变化，难道不正如此吗？

经济学同其他学科（不仅是人文学科，而且也包括自然学科）一样，实际上都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接力赛跑。后人是有幸的，为什么？因为有一代又一代前人已经在学科探索的道路上作了不少努力。后人总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即使前任在前进过程中有过疏漏，有过

判断的失误，那也不等于后人不能由此学习到有用的知识或得出有益的启示。

我相信，机械工业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会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关注经济学的进展，促进中国经济学界的研究的深化，并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2014年9月21日

丛书序二

何 帆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 世纪，尤其是 20 世纪后半叶，是经济学家人才辈出的时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全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瑞典中央银行于其成立 300 周年的时候设立，并于 1969 年首次颁奖。这一奖项被视为经济学的最高奖。截至 2014 年，共有 75 名经济学家获奖。

我们当然不能仅仅以诺贝尔奖论英雄。有些经济学家英年早逝，未能等到获奖的机会。诺贝尔经济学奖主要是授予一个领域的代表人物的，但有些领域热门，有些领域冷门，博弈论是发展最为迅猛的一个领域，研究博弈论的经济学家有很多高手，可惜不能都登上领奖台。有时候，诺贝尔奖的授奖决定会引起争议，比如 1974 年同时授给左派的缪尔达尔和右派的哈耶克，比如 2013 年同时授予观点相左的法玛和席勒。尽管同是得奖，得奖者的水平以及学术重要性仍存在较大的方差。但是，总体来看，可以说，这 75 位经济学家代表了 20 世纪经济学取得的重大进展。

经济学取得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经济学发展出了一套系统的分析框架，从基本的假设出发，采用严密的逻辑，推导出清晰的结论。受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会发现和同行的学术交流变得非常方便、高效，大家很快就能够知道观点的分歧在哪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经济学形成了一个分工细密、门类齐全的体系。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经济计量

学是经济学的旗舰，后面跟着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主力，以及法律经济学、实验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新兴或交叉学科；经济学提供了一套规范而标准化的训练，不管是在波士顿还是上海，是在巴黎还是莫斯科，甚至是在伊朗，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使用的大体上是同样的教材，做的是同样的习题。从初级、中级到高级，经济学训练拾级而上，由易入难，由博转精；经济学还值得骄傲的是，它吸收了最优秀的人才，一流大学的经济系往往国际化程度最高，学生的素质也最高；在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济学成为一门显学，经济学家对经济政策有重大的影响，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里有经济学家，大众媒体上经常见到活跃的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科经常会到经济学的殿堂里接受培训，然后回到自己的阵地传播经济学的火种。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经济学发展到今天，遇到了很多“瓶颈”，创新的动力明显不足。经济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整齐划一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单调乏味。有很多人指责经济学滥用数学，这种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击中要害。经济学使用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数学，即极值方法。消费者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他们在预算的约束下寻找效用的最大化。企业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它们在资源的约束下寻找利润的最大化。政府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它们在预算的约束下寻找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经济学的进步，无非是将极值方法从静态发展到动态，从单个个体的最大化发展到同时考虑多个个体的最大化（博弈论），从确定条件下的极值发展到不确定下的极值，等等。其他学科，比如物理学、生物学也大量地使用数学工具，但它们所用的数学工具多种多样，变化极快，唯独经济学使用的数学方法仍然停留在原地。

经济学遇到的另一个问题是较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经济学家原本也是各执一词，争吵激烈，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要“和平共处”。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学不仅在研究方法上“统一”了，思

想上也要“统一”，经济学界对异端思想表现得格外敏感，如果你跟主流的思想不一致，就很可能被边缘化，被发配到海角天涯，根本无法在经济学的“部落”里生存。这种力求“统一思想”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经济学的自我批判、自我更新。

经济学常常被批评为社会科学中的“帝国主义者”，这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经常会渗透到其他学科，更主要的是因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交流并非双向而平等的，别的学科向经济学学习的多，而经济学向其他学科学习的少。经济学变得日益封闭和自满，讨论的问题“玄学”色彩越来越浓厚，往往是其他学科，甚至经济学的其他领域的学者都不知道讨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于是，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的交流就更加少，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现实的挑战。20世纪中叶经济学的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战后重建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的回应。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引起了经济学的又一次革命。如今，我们正处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新阶段，经济增长前景不明，金融风险四处蛰伏，收入分配日益恶化。这些复杂的问题给经济学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经济学或将进入一个反思、变革的新阶段，有可能迎来一次新的“范式革命”，年轻一代学者将在锐意创新的过程中脱颖而出。

创新来自继承，也来自批判。机械工业出版社拟推出“诺贝尔经济学奖经典文库”，出版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的各类著作，其中既有精妙深奥的基础理论，又有对重大现实问题的分析，还有一些是经济学家们对自己成长道路的回忆。有一些作者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也有一些是过去大家了解不多，甚至已经淡忘的。这将是国内最为齐全的一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系列丛书，有助于我们对20世纪的经济学做出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站在巨人的肩头，眺望21世纪经济学的雄伟殿堂。

2014年12月12日

译者序

乔治·施蒂格勒(1911—1991),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乃至别人对他的评论,只要轻点手指,网上一搜,便能轻松获得成千上万条信息。

本书为其自传。与一般自传不同,在这本约200页篇幅的著作中,作者对于自己在经济学研究领域所获得的卓越成就,着笔并不多,反倒是对其老师、同学和同事们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泼墨挥毫,一点都不吝惜。对于自己学习和工作过的任何一个机构中有鲜明特色的人物,他都如数家珍,将其成就和特点通过各种轶事娓娓道来。幽默俏皮的话语、睿智机敏的评论,时时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又陷入深深的思考。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深信,如果希望深入了解当代经济学的成果,就应当细细考察做出这些成果的学者们学习与研究的环境和方法。在本书中,他把自己也当成一个被考察的对象。

与查尔斯·巴贝奇的自传也不同,作者对于同行和业界没有丝毫抱怨,反倒是充满了感激,尽管他与巴贝奇一样,“对所处学术圈的各种主流观点几乎都持有异议”。作者的幽默是公认的,无怪乎经济学家何帆会说,他要是走进乔治·施蒂格勒的办公室,可能会很快放松下来,甚至还敢鼓足勇气和教授开个玩笑。

虽然作者在经济学研究中获得的最大成就，无疑应归为创立信息经济学和管制经济学，但是其初心最感兴趣并且贯穿整个研究生涯的，还是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也是关于经济学科的学术史。他在自传中对于经济思想的思考和探究贯穿始末。开篇的引言即问道：“经济学家是好人吗？”结论是，并不能确切地辨别经济学家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经济学家拥有的善良、勇敢、慷慨或忠诚等美德并不比普通人多，也不比普通人少。经济学家大幅加深了人们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理解，因此经济学家的存在是必要的。不过，即使人们同意这一点，也并不意味着要求他们一定要喜欢经济学家：“就像对待殡葬业的态度一样，人们可以不喜欢这一行业，但其存在确实必要。”

在全书的最后一章，作者又提出了一个问题：经济学家乃至整个学者阶层到底是怎样行事的，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作者介绍了自己的两个发现。第一个发现是，经济学大家们很少承认或者修正自己的错误，即使是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表示承认，往往也是偷偷摸摸的。他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前者：亚当·斯密对限定最高利率的认识，以及维也纳经济学家欧根·冯·庞巴维克对联立方程作用的想法。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自己提出的个人所拥有财富的总效用的论述，是作者用来说明后者的例子。第二个发现是，有头脑的学者很少会改变自己的想法。他们就像是传播福音书的传道士一样，矢志不渝、不厌其烦地向学术同行传播他们所信奉的新思想。

此外，作者还有一个发现，学者们总是特别喜欢参考学术前辈的研究，不管这位前辈是他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通常也不管他们是否读过这些前辈的作品。为什么呢？作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通过研究学术史，作者更深切地理解了两点：一是，即使是最优秀的学者，也会受到知识和想象力的局限；二是，读者可与卓越的思想建立联系。

伟大的头脑总是相通的。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能

够阅读到一位睿智练达之人，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剖析自己学术史的著作，就已经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了。而有幸翻译这部著作，跨越语言与文化，字斟句酌，仔细揣摩玩味原作者字里行间的思想，并以适宜的方式表述出来，就更加神远，视通更逾万里。真乃平生一大快事！

感谢所有在我生命中给予帮助、寄予期待的家人、师友！我爱你们。

李君伟

2016年1月

前言

查尔斯·巴贝奇 (Charles Babbage) 是 19 世纪英国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不受同行欢迎的人。他一生的经历丰富、传奇。他的自传特色鲜明、不依常规，大量篇幅都在讲述自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只用了短短一章介绍自己的成就和荣誉。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稀缺的，包括在任何一个领域来自同行的赞誉。巴贝奇对他所处学术圈的各种主流观点几乎都持有异议，我也是这样的。由于我比他对同事的批评要少些，因此我的经济学家同行对我也非常宽容。半个世纪以来，在美国经济学界，我还没有激起大家的愤怒，大家对我的抱怨也不多。

感谢阅读了全部或大部分书稿并给予评论的朋友们。首先是克莱尔·弗里德兰 (Claire Friedland)，她一如既往地改正了我容易出错的地方，并且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他还有罗斯 (Rose) 和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夫妇、查伦 (Charlene) 和理查德·波斯纳 (Richard Posner) 夫妇、约翰·豪斯 (John Hause)，以及维尔吉尼娅 (Virginia) 和斯蒂芬·施蒂格勒 (Stephen Stigler) 夫妇。

乔治 J. 施蒂格勒

经济学家是好人吗

经济学家作为一个独立的物种，直到 18 世纪末期才首次被识别出来。1790 年，英国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发表了他对欧洲未来的悲观预言：“骑士的时代已经结束，继之而来的将是诡辩者、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的时代，欧洲的辉煌已经永远地消逝了。”^①这么小的群体可以摧毁一个如此伟大的文明，我想，经济学家们可以因此获得一些尊重，当然这种成就不可能赢得大家的喜爱或者崇敬。显然，柏克错了。历史已经证明，英国的 19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在经济、科学甚至道德领域都获得了长足进步。诡辩者无疑是一群吹毛求疵或不靠谱的热衷于推理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发挥过什么好作用，但经济学家和计算机都没有给社会制造什么麻烦，甚至他们为这个辉煌的世纪还贡献了一些力量。

然而，贬损经济学家的传统已经形成，并且社会各阶层的人们都对此津津乐道。我并不准备一一细数这些贬损，它们往往是充满敌意的攻击，而非智慧的辩论。不过我对此充满了疑问，为什么谴责经济学家如此流行（即使假定他们理应受到谴责）？主要的原因显而易见——经济学家是对很多

① 埃德蒙·柏克《法国革命论》（1790 年，1959 年再版，纽约：霍尔特、瑞因哈特和温斯顿），第 91 页。

社会改进方案都会“泼冷水”的人，对于赞成这些方案的改革者和慈善家来说，经济学家只会令人感到绝望。

手边现成的一个例子是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他就是通过令别人的希望破灭而使自己获得巨大声誉的典型。那时他刚从剑桥大学毕业，是一位年轻和蔼的牧师。他的父亲丹尼尔（Daniel）实际上是一位改革者，信奉卢梭（Rousseau）和英国无政府主义者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的思想。1794年，丹尼尔出版了《政治正义》（*Political Justice*）一书，批评把世界上各种麻烦的根源都归咎于婚姻和财产等制度安排的观点，认为只要制度运转良好，人类社会就可以臻于“至善”（或者至少可以达到道德优良、舒适安康的程度）。托马斯·罗伯特不同意父亲的看法，他相信自己发现了人类社会在通向“至善”道路上的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对性的热衷”。由于人类的繁育能力远远超出了人类本身和大自然所能提供的生存资源，因此这种“对性的热衷”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出生的孩子数量远远大于世界所能养活的数量。马尔萨斯对自己的观点很自信，于1798年匿名出版了《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他本人因此赢得了不朽的声望，但他和经济学家们却长期戴上了“社会改进方案的冷血批评者”的帽子。他的这种悲观主义也成为经济学是一门“沉闷的科学”的来源。即使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在1825年以后越来越不流行了（因为它是错的），经济学家仍然继续对社会改进方案持批评态度，哪怕是明显地对社会有益的方案。我特别喜欢的可以代表经济学家怀疑精神的例子，是杰出的爱尔兰经济学家芒梯福特·朗菲尔德（Mountifort Longfield），他同时还是一位律师。

在英格兰一些地区有一种风俗，即家境富裕的人们在小麦极度短缺的时候收购小麦，然后以半价卖给穷人。显然这些富人的行为是纯粹的利他主义的。1834年，朗菲尔德指出〔在他的《演讲集》（*Lectures*）中〕，这

些富人的做法完全或几乎完全是没有意义的。原因很简单：假定小麦短缺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下一个丰收季的到来，那么穷人可以获得帮助的唯一途径是富人少吃些小麦——经济学家通过数学计算可以证明这一点。朗菲尔德天才般地证明：只是通过金钱在不同人手中买卖小麦，是不能在小麦收割之前生产出新小麦的，富人这种善行只是肥了谷物交易商。无论穷人能不能以半价购得小麦，他们最终为购买小麦花费的钱数一样多，获利的只是最初拥有小麦的人。这种最具善意的行为，最终毫无意义。

经济学家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职责，是依据经济学的逻辑给出苛刻精准的分析：无论是在朗菲尔德的时代，关于以半价向穷人出售小麦这一事例的分析，还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关于根据法令要求而设定最低工资或最高利率的分析，一如既往，概莫能外。经济学家总是为人们带来坏消息，也因此赢得“坏信使”的名声。

我并不认为经济学家的这种社会职责无必要或者不重要。在一个人们努力想把事情办好却适得其反的社会，应该有人来指出这一点。就像医生有义务提醒病人，有些秘方对于治愈疾病毫无作用甚至还可能有害；或者像工程师有义务告诉立法机构，这个世界并不存在永动机一样。经济学家的职责也是如此。著名的古典主义学者、牛津大学教授本杰明·乔伊特（Benjamin Jowett）对此的论述令人拍案叫绝。弗朗西斯·鲍尔·科布（Frances Power Cobbe）——在维多利亚时代，此人以反对活体解剖而闻名于世，同时还是一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曾经对经济学家发难。1861年，乔伊特针对科布的观点发表言论，为经济学家辩护：

寥寥数行，对您惠赠我书谨致谢忱。我已拜读大作，并且非常喜欢。

您的书论述了很多社会问题，简明扼要、笔触细腻，非常有意义。

但是，请不要与政治经济学为敌：

- （1）因为政治经济学家是一个强大而又危险的群体；
- （2）因为一旦背离人都是自利的这一常识，法律就将漏洞百出；

(3) (您可能不赞同) 因为政治经济学家通过呼吁自由贸易等为

劳工阶层争取到的利益, 比所有慈善家所做的善行之和还要多。

至于表达习惯, 我希望尽可能避免使用像“使命”之类带有慈善行业特有的情感丰富的词汇, 因为受过教育的人不太习惯使用这类词。当然, 在募集善款的时候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还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毫无疑问, 如果政治经济学家可以修正他们的表达习惯, 他们也可以在募集善款时取得不错的成绩。世事如此纷繁复杂, 阳光无法直接射入心灵。仅凭感觉, 是无法引领人们寻找到探索社会的最佳途径的。

您看, 我试图将所有的人文学科都与政治经济学联系起来。也许会有人批评这种想法, 认为这种联系是不可能实现的。请谅解, 以上是我的考虑。^①

如果想对上述颂扬进行反驳的话, 是很困难的。经济学家大幅加深了我们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理解, 而这正是科学家的职责所在。如果否认经济学家所做的这些贡献, 难道不觉得无礼甚至是无知吗?

经济学家的存在是必要的。即使人们同意这一点, 也并不意味着要求他们一定要喜欢经济学家。就像对待殡葬行业的态度一样, 人们可以不喜欢这一行业, 但其存在确实必要。并不能确切地辨别经济学家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经济学家拥有的善良、勇敢、慷慨或者忠诚等美德并不比我们普通人多, 当然也并不比普通人少。之所以他们希望别人多少给些褒扬, 是因为他们稍稍有那么一点与众不同。其实我们也同样会有这样的要求。经济学有一整套具备可操作性的、可供实证检验的理论体系, 是社会科学中唯一一门得到合理发展的学科(瞧, 我是怎么说过谦虚来着的)。由于长期徜徉于经济科学中, 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与常人稍有不同, 我觉得这些不同将会非常有趣。

① E. 阿尔伯特·L. 坎贝尔编《牛津大学贝列尔学院硕士本杰明·乔伊特书信集》(纽约: E. P. 达顿, 1899年, 第173页)。